



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饭店



老北京饭店厨房旧影

北京饭店,新中国的见证者

位于北京市中心黄金地带的北京饭店,是名副其实的北京老字号,其历史可追溯至清末。1900年,法国人傍扎和自来地在东交民巷外国兵营东侧开了一间小酒馆,店面不大却生意火爆。翌年,小酒馆搬至兵营北侧,悬挂响亮而瞩目的“北京饭店”招牌。此后二人先后撤出经营,意大利人贝郎特和卢苏随即加入。贝郎特去世后,卢苏成为小酒馆唯一的主人。经营获利后寻觅新址,最终选定之地便是现今北京饭店的位置,即东长安街与王府井的交会处,毗邻天安门与故宫。卢苏欲盖五层楼,但凭一己之力难以继。中法实业银行将其收购后,在原有基础上斥资修建欧式五层红色砖楼,一直使用至1954年改扩建之前。从晚清进入民国后,北京饭店声名鹊起,与六国饭店齐名,成为北京最知名和最高档的餐饮、住宿场所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饭店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是新中国接待与宴请国内外贵宾、举办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这一特殊性使得北京饭店成为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无声见证者。□ 据《北京晚报》

北京饭店承办的重要宴会不胜枚举,令北京饭店员工最为自豪的还是“开国第一宴”。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举行的开国大典,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在这样的历史性时刻,中国人民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典礼结束后的国庆招待会选定在北京饭店举办。当晚,北京饭店宴会厅里一片喜悦、祥和的气氛,多位技艺超群的顶级厨师以百般的工作热情,在后厨紧锣密鼓地煎炒烹炸,用心制作每一道菜肴。上世纪三十年代便进入北京饭店工作的郑连福安排宴会事宜经验丰富,此次“开国第一宴”被任命为“宴会总管”,负责总调度。重任在肩的他穿梭于前厅、后厨,忙得不亦乐乎。

据了解,“开国第一宴”头道菜是燕菜汤,凉菜有酱牛腱子、兰花干、四宝菠菜、肴肉、炆黄瓜、桶子笋鸡、油吃冬菇、醉冬笋、五香肉干等。热菜有扒黄肉翅、烧四宝、红烧鸡块、冬菜扒鸭、大煮干丝、红烧鲤鱼、红烧狮子头、冬笋太古菜、糖醋排骨、罗汉斋等。点心有淮扬汤包、炸春卷、黄桥烧饼等。菜品种类非常丰富,用餐人数多达600余人,总厨师长朱殿荣面对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番思忖后决定动用大锅,一锅烧出供几百人吃的主菜。谁说“大锅菜”是平庸甚至是难吃饭菜的代名词?北京饭店名厨凭借高超的烹饪技艺,让“大锅菜”华丽转身,成为人人赞不绝口的美味佳肴。

在1959年人民大会堂落成之前,历次国庆招待会多在北京饭店举办,或由北京饭店选派厨师及服务人员协办。除了国庆招待会,北京饭店还承办各种国内会议招待宴会,以及外事活动中重要的一项——国家领导人招待外宾的国宴。如1957年,毛泽东主席宴请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胡志明在革命时期曾多次来到中国南方地区,对粤菜情有独钟。北京饭店的粤菜名厨、来自广东顺德的康辉根据客人的饮食

习惯用心烹饪,其中的一道炸脆皮鸡成为胡志明最为喜爱的菜肴之一,每次访问中国都要邀请康辉做这道菜,有时还叫上康辉一同用餐,并多次赠送小礼品,以表谢意。康辉的烹饪技艺得到国内外多位领导人的认可。多位像康辉这样的国宝级烹饪大师在北京饭店服务,因此每次宴会上的菜肴总能令人惊艳,北京饭店的名号越发响亮。

北京饭店除了提供餐饮、住宿、会议等常规服务外,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那就是理发业务。北京饭店在1949年以前便设有理发室,为客人提供理发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此服务项目延续下来,多位中国领导人以及外国政要曾来此理发。理发师朱殿华早早进入北京饭店理发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二十余年来为周恩来理发,与总理结下深厚的友谊。另一位理发师郭文福,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北京饭店理发室工作,曾参与过毛泽东标准像上的发型设计。

此外,据曾在北京饭店会计科工作的彭晓东回忆,1979年冬季的一个夜晚,他曾在北京饭店楼道里偶遇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当时是与夫人卓琳同志一同来北京饭店理发的。在等候的空闲时间里,邓小平同志还不忘向偶遇的彭晓东了解北京饭店外宾入住以及客房出租率等有关情况。

作为北京老字号的北京饭店,矗立于长安街上一百余年,历经沧桑却仍焕发着神采,迎接八方宾客。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北京城百废待兴,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接待场所尚未修建。然而,内政、外交各领域的工作千头万绪,在实际的工作推进中,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较多承担接待的事务。在那样的时刻,北京饭店凸显了其历史使命,也在随后的历史中坚持着服务于国家、服从于大局的初心,擦亮了这块北京老字号的招牌。

蔡元培与胡适论战《红楼梦》

蔡元培在翰林院供职时,阅读了《郎潜纪闻二笔》《乘光舍笔记》等书后,被《红楼梦》深深吸引了。在随后10多年的时间里,他陆续考证相关故事10余则,随后束之高阁。1914年,他重新修改《石头记索引》交商务印书馆,1917年9月出版单行本。蔡元培开篇就写道:“《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民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

《红楼梦》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自问世以来,受到众多文人的喜爱。光绪年间,“红学”盛行,几乎能与“经学”相提并论。见仁见智,很是热闹。民国后,文人们亦热情未减。蔡元培是学界名人,也亲身加入研“红”行列,引来不少热捧,这个单行本一直发到10版,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胡适在红学方面的研究也颇有成果,他出版《红楼梦考证》,新红学派由此诞生。该书系统考证了曹雪芹作者本身,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传结论,并对过往红学研究予以尖锐批评,说走错了方向,只去收集不相干的资料,而不去关注作者、家世、时代、版本等问题。胡适称旧红学只作了《红楼梦》的附会,而不是真正的考证。

蔡元培难以接受胡适的观点,他在《石头记索引》第6版中标明“对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说明自己证疏的原因和方法,自信地表示,“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表示胡适的观点不能征服他。

对此,胡适并不赞同。随后发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其中含“答蔡子民先生的商榷”,指出蔡元培所用方法过于守旧。两位大学者的争论轰动一时,被称作“一场震撼全国的论战”。蔡、胡之争并无结果,两人仍各执己见。直到20世纪30年代,相关著作时时有出现。

□ 据《人民政协报》

梅兰芳卖画

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不仅在戏曲表演艺术方面以雍容华贵、中正平和的气度征服了世界,而且在绘画艺术方面也有着极高的造诣。

梅兰芳与著名画家齐白石有着很深的交往,曾经师事齐白石,向他讨教丹青技艺,人前人后都对齐白石恭恭敬敬。有一次,齐白石前往朋友家中做客,客人大多为社会名流。齐白石一向很少出门应酬,认识他的人不是很多。片刻,主人堆着满脸笑容陪梅兰芳走进客厅。众人纷纷上前握手、寒暄。梅兰芳一眼看见一旁独坐的齐白石,便径自走上前去,恭敬地叫声“老师”,还将老人给身旁的客人一一介绍,使老人不再尴尬。

这让齐白石深为感动,回家后他便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赠给梅兰芳,还在画上题诗:“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梅兰芳收到画和诗后,十分感慨,他认为学生敬师乃天经地义的事情,却蒙齐白石如此感激,心中不安,于是给齐白石回诗一首:“师传画艺情谊深,学生怎能忘师恩。世态炎凉凉如此,吾敬我师是本分。”

梅兰芳学画,起初只为怡情养性,不想后来竟以此来养家糊口。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第二年,梅兰芳率团赴香港演出。演出结束后,梅兰芳让剧团回沪,自己决定留居香港。1941年,香港也沦陷了,他只好返回上海。

返沪之后,梅兰芳蓄须明志,不为日、伪演戏。戏不演了,收入没有了,生活渐渐拮据了。这时,有朋友来劝梅兰芳卖画。梅兰芳觉得这倒也是一个维持生计的办法,便在原有学画的基础上苦攻画技,日日挥毫不辍,遍临名家作品。1945年春天,在上海画界朋友吴湖帆、汤定之、叶玉虎等人的鼓励和帮助下,梅兰芳和叶玉虎联袂举办了一个画展,展出近200幅作品,几乎全都售出。

□ 据《人民政协报》